

書評

Exclusion and Socio-Cultural Identities: Systems Theoretical and Poststructuralist Perspective, eds. by Urs Stäheli and Rudolf Stichweh, Stuttgart: Lucius & Lucius, 2002, 152 pages, 25 Euro.

《排除與社會—文化的認同：系統理論與後結構主義的觀點》一書是以 Niklas Luhmann 為開山宗師的系統理論代表期刊 *Soziale Systeme: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sche Theorie*（社會系統：社會學理論雜誌）近一期（Vol. 8, No.1）的專號，全書皆以英文寫作，¹不再有因著德文而來的閱讀障礙，因此筆者想藉此機會為文引介，提供一般華文讀者另一種觀看世界的角度。不過，引介本書更重要的理由在於，它所探討的是涵括／排除(inclusion/exclusion)與認同構成的關聯此一重要議題，並提出了一些值得參照、比較的看法。

本書的副標題已表明，後結構主義是構成本書討論的另一理論進路。系統理論和後結構主義兩種不同的立場之所以能收錄於同一本書，在於兩者不但有重要的共通之處，也有關鍵的差異，值得互相借鏡。正如編者所言，兩者不但都指出涵括必定意涵著排除做為另一面，而且也明示了，現代社會中不可能有對人的全面涵括。更進一步，以涵括／排除的現代形式做為關懷的焦點，兩者闡明，認同的問題之所以會在現代變得如此顯著且棘手，是因為涵括一切的、穩定的認同範疇崩潰了，而這根源於現代社會主要的系統分化形式不再立基於以成員身分(membership)為系統界限的模式（頁 5，另參見頁 13，

1 以往此一期刊雖也接受英文的稿件，畢竟仍以德文論文為主。唯自此期起，在編輯群及主力作者群並無太大更替的情況下，全刊首次皆以英文論文組成，且下一期亦然，顯見系統理論的追隨者亦想藉此來突破語言限制的門檻，提高自己在世界科學系統中的可及性。

104-106)。

這樣的診斷可以藉由歷史的比較分析為之。例如，藉由比較陌生人 (stranger: 就此關聯來說，稱做外來者或許更貼切些) 與涵括／排除這兩個毋寧是接續而非合致的歷史語意，Rudolf Stichweh 指出：前者不但只是後者的一個特例，並且是建基於封閉的成員身分的模式，從而難以適用於現代因功能分化而來的原子化了的認同的情形。因為現代的認同不只是多重而已，而且常互相切割，並只是部份時間的 (part-time)，視情境而改變，再沒有一種能把血肉之軀的人連同其各式各樣的角色全涵攝在內的認同，再無法把人視為不可分割的整體來涵括 (頁 104-108)。此一看法來自系統理論及後結構主義共享的「後人文主義」的觀點。用系統理論的話來說，人是社會系統的環境，溝通才是構成社會系統最基本的元素。² 循此，涵括並非將個體的全部存在——包括他的心理系統及軀體——都包含進來，而只意指在溝通中將之視為可充作接收者的「個人」(person) (頁 3-4)。³

相應地，雖然排除逐漸成為日常的語意，變成指稱社會上被剝奪權力的一般詞彙，在此卻必須嚴謹地將之界定為「被排除於社會溝通之外」，而且主要並非指某一單一事件。因為在功能分化的社會結構下，只有在某人同時被多個社會系統排除，且這些排除彼此相關的情況下，排除才成其為問題 (頁 8-9, 104)。在正視溝通的重要性及扣緊現代社會的結構來立論的基礎上，系統理論指出，在今天，相較於被排除於社會事件之外 (亦即被排除於取得通往溝通的管道的可能性之外)，被排除於取得物質資源管道之外毋寧是較不重要的，並常是由前者衍生來的後果 (頁 102-103)。藉此，系統理論把對弱勢者的單純關懷轉化成嚴肅的理論反省工作。

Cornelia Bohn 和 Alois Hahn 則結合了 Michel Foucault 和 Luhmann

2 關於系統理論對於溝通作為訊息、告知及理解三個選擇的綜合的特定理解，參見 Kneer and Nassehi (1998: 102-118)。關於溝通理論作為行動理論的替代選項，參見 Stichweh (2000)。

3 進一步可參見 Stichweh (1988: 268-278)關於不同的涵括形式的討論。

的觀點，展現出歷史比較的另一可能向度。他們指出，隨著從階層分化到功能分化的社會轉型，不但出現了更強的涵括要求，而且排除的力量也一併加強了，一如 Foucault 關於規訓的分析所揭示的：新的排除形式同時是種涵括，一種涵括式的排除（頁 14-15, 24）。更關鍵的，藉著分析財產、民族及宗教所涉及的涵括／排除現象，他們梗概地描繪了轉變的過程。他們說明了對他人意謂著排除的財產如何一度起著參與社會的前提的作用，導致新的認同及排除的形式；以及「民族」的觀念如何暫時彌補了前述社會轉型過程中產生的排除效果，使得疆域國家的分支分化意外扮演了促成（世界）社會的功能分化不可或缺的角色（頁 15-18）。作者並進而強調，世俗化是前述整個轉變的重要背景，而且重點不在於宗教喪失了認知上的可信度，而在於它從社會的主要整合力量退居次系統的地位（頁 21-22）。正如作者所明言，以西方的經驗來說，宗教不但表現為分化出來的功能系統的較早形式，而且早在階層分化的社會中，宗教便具備了「現代的」涵括／排除模式，一種不取決於身分的個體化形式：不論是貴族還是平民，每個人都同樣面對被詛咒的排除風險，也都有著原則上相同的救贖的涵括機會（頁 15）。

此外，系統理論主張說，在上述轉型過程中，出現了從涵括的個體性到排除的個體性(exclusion individuality)的轉變(Luhmann 1993: 154-165)。個體不再如以往一樣是經由涵括，經由確切不移的成員身分獲得個體性的。在身為血肉之軀的個體被排除在外，而只能透過角色來參與的情況下，個體只還能藉由對諸多異質的、部份的涵括進行個別的綜合來獲得及展現出自己的個體性。「沒有哪一個個體完全且只被整合進某一功能系統中，相反地，就個體性做為一個整體來說，它恰恰是避開了諸功能系統選擇性觀點的那些東西」（頁 5）。不過，並非所有系統理論的追隨者都滿足於排除的個體性此一「抽象的」概括表述，像 Armin Nassehi 收於本書中的文章，便試圖將探討的重點轉移到經由各個功能系統涵括過程而來的個體化，希望藉此深化關於個體性的討論，並指出可能的經驗研究的方向。

與個體性緊密關連的是認同的問題。對此，系統理論固然也提出了不少敏銳的洞見，筆者卻不得不同意編者所言，迄今爲此，「系統理論雖爲思考涵括與排除的過程提供高度發展了的詞彙，卻只簡略提及涵括及／或排除所造成的後果，也就是社會—文化認同的問題」（頁 4）。這正是系統理論得以借鑑於後結構主義之處。這樣的借鑑之所以可能，在於它與後者同樣採取反本質主義的立場，不把認同視爲穩定的範疇，而視之爲不穩定的認同過程，在時間歷程中不斷重覆及／或變化著。

Oliver Marchart 便在涵括／排除與認同構成的關聯的脈絡下，以流行電影"Star Trek - First Contact"（星艦迷航記：第一類接觸）爲例，細緻地討論了「劃界」（drawing a line）的意涵，進而指出政治的可能性在於游移於多重但有限的界限間。作者採後結構主義的進路，認爲劃界此一「空的」（以沒有任何其它東西先於此一奠基的命令，故名之）動作是任何認同賴以形成的前提（頁 75-76）。他援引 Slavoj Žižek 的觀點，說明藉著劃出界限，欠缺的主體(subject of lack)同時既被「排除進」（excluded into），又被「包含出」（included out of）由劃界動作所建立的象徵秩序或認同。此一弔詭的關係揭露了，被排除者對認同的形成來說是「構成性的」（constitutive），也就是必然隨之出現，且爲其前提的（頁 78-79）。在此基礎上，作者進一步指出，如果人們只劃一條界限，只建構「絕對的」敵人的話，其後果只能是滅亡。因爲這種全面化的恐怖主義，不是導致自我毀滅，便是完全消滅了敵人，因此也消滅了自己的認同。反過來，如果有著無窮的戰線與敵人，且彼此間沒有任何的原則可將之聯結起來，也一樣不會出現政治，而只是種個體主義的無政府主義（頁 84-86）。

雖然後結構主義對於認同構成的一般分析，以及對涵括與排除的過程所造成的，與功能分化並不一致，但又持續存在的認同（如性別與族群）的特別觀察，可補系統理論的不足，但後者反過來亦不無足堪前者攻錯之處。例如，就認同的建構來說，系統理論不但呼應前述以劃界爲不可或缺的第一個動作的觀點，⁴ 而且還引進「遞迴的自我

指涉網絡」概念為輔助，能更圓融地闡明「無中生有」的情形。另外，系統理論對語意與社會結構面向的區分，對功能分化所形塑的社會結構的重視，以及從可一般化的穩定期望的角度來理解社會結構等觀點，對後結構主義來說或許也有可參照之處。

只是，兩者間也有不容忽視，乃至不易克服的歧見。例如，後結構主義堅持從論爭及敵對的（論述）實踐的觀點，根據 Antonio Gramsci 傳統的霸權模型來分析認同的構成，強調力的要素（頁 3, 76-77），以致於不單如編者所說，往往忽略了涵括及排除的條件常為功能系統所結構化，而且還窄化了對認同的理解。依系統理論的看法，認同固然以一併建構了某一作為外邊(outside)的被排除者為前提，但不必然都遵循著政治的敵／友邏輯——即便這往往是最清楚且常見的案例。相對地，系統理論雖然正視了將每一個人涵括進功能系統此一全面涵括的語意與社會結構層次上存在著排除的現象二者間的緊張，但它對排除領域的探討毋寧仍是不足且無力的。Friedrich Balke 的論文便指出 Luhmann 對排除領域的立論，不但立基於（對巴西貧民窟）觀光客式的印象，而且呼應於 Lévi-Strauss 對印度「群眾」的觀感，把它歸入「超越界限之外」，無法用言語描述的「赤裸裸的生命」的範疇。

此外，編者提及後結構主義的進路可超越系統理論排除的個體性的看法（頁 5-6），可惜全書未見任何相關的申論，遑論提出替代的觀點。這曝露了本書的一個缺點：在呈現出廣度之餘，諸論文間的關連卻嫌太弱，以致雖稱專號，但並非詳盡規劃的產物，未能全面鋪陳與主題相關的議題及論點，未免美中不足。

儘管如此，書中所提出的切入角度及論點，多少有助於我們釐清及反省台灣當前關於國家認同及族群的爭議。現代社會再也不是立基於依著單一且封閉的成員身分而來的系統分化，任何界限都有其恣意性，而界限的絕對化只是帶來毀滅。認知到此一事實，或許人們慢慢

4 也就是系統論以之為礎石的 Georg Spencer-Brown (1979)關於區分，關於形式的法則的觀點。

能平心靜氣些，不再急於行動，急於劃界，急於要求全面的涵括及相應的忠誠，而能慢慢學習切事地面對種種不同的區分、爭議與戰線，充分發揮「政治」的可能性，以創意及彈性來解決諸多並非一定要爭個你死我活不可的問題。這麼說並不表示筆者認為當前的諸多爭議是假的爭議，是得以輕易解決的問題。因為民族主義固然常呈現為全面涵括的傳統形式，但絕非演化的殘餘，而是如學者一再強調的，是現代才有的現象。而且，正如 Urs Stäheli 在本書中指出的，在現代功能分化的情境下，功能系統總是面對著涵括的難題，以致常出現由引誘及「不適當的」過度普遍化所造成的過度涵括的現象。換句話說，民族主義某個程度上可說是現代社會的必然產物。只是，人們如何談論它有著絕不容輕忽的影響，因為按系統理論的建構論立場來看，這正是在建構現實，是現實的一部份！如果人們打著解構族群的旗號，實際上卻助長了族群的建構而不是解構了它，往往正在於他們忽略了社會運作自我指涉的效應，未能把自己的建構的可能後果也考慮進來。

誌謝：感謝李令儀及李航在本文寫作上所提供的幫助。

湯志傑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參考文獻

- Kneer, Georg and Armin Nassehi (1998) 盧曼社會系統理論導引，魯貴顯譯。台北：巨流。
- Luhmann, Niklas (1993) Individuum, Individualität, Individualismus. Pp. 149-258 in *Gesellschaftsstruktur und Semantik, vol. 3*. Collections by Niklas Luhmann. Frankfurt: Suhrkamp.
- Spencer-Brown, Georg (1979) *Laws of Form*. New York: E. P. Dutton.
- Stichweh, Rudolf (1988) Inklusion in Funktionssysteme. Pp. 261-293 in *Differenzierung und Verselbständigung. Zur Entwicklung gesellschaftlicher Teilsysteme*. By Renate Mayntz, Bernd Rosewitz, Uwe Schimank and Rudolf Stichweh. Frankfurt: Campus.
- (2000) Systems Theory as an Alternative to Action Theory? The Rise of 'Communication' as a Theoretical Option. *Acta Sociologica* 43: 5-13.